

大象学术书坊

学林清话

傅璇琮 著



大象出版社

近年来，有好几位学界友人向我提出，建议我将二十余年来为人所作的序文汇编一书。有感于友情，亦本于自我慰勉之意，我就于去年下半年陆续搜集，至今竟辑得七十三篇。

我之所以将此书起名为《学林清话》，即本于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中之“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句。

大象学术书坊

學林清話

傅璇琮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清话/傅璇琮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7-5347-5102-8

I. 学… II. 傅… III. 序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271 号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石更新 裴红艳

装帧设计 张帆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址 www.daxiang.cn

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75

定价 3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自序

近年来,有好几位学界友人向我提出,建议我将二十余年来为人所作的序文汇编一书。有感于友情,亦本于自我慰勉之意,我就于去年下半年陆续搜集,年底竟辑得七十一篇。我遂与大象出版社联系,大象出版社毅然接受,并于今年上半年排出校样。最近我审阅二校,手头则又有今春为二位学者所写之序,书都已出版,于是又补辑进去,则全书共有序七十三篇。我想,我们古典文学界,无论前辈或中青年学人,能为人作序有如此之多者,当甚稀见。这对我来说,不免有自诿并自我慰勉之情。

序也是中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就现在来说,为他人所作序与书评,总是两种文体,书评须作全面客观的评论,序言可抒己见,自由一些。宋许颢《彦周诗话》曾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我在为傅明善《宋代唐诗学》所作序中,即引有许颢语,并仿其语气,对序言的体制定为:“序文者,辨学术,论世情,记交谊,抒己见,重理趣也。”这当是我作序所本的旨意。

具体来说,我为友人作序,大致有两种意向,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述“切于学”的旨趣。所谓“淡如水”,即“君子之交淡如水”。特别是几位年龄较长于我及大致同龄的友人,我与他们确有君子之交。如我所作的第一篇序,即于1981年10月所写的陈贻焮《杜甫评传》序。贻焮先生年岁比我大,1953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1955年夏我毕业留校为浦江清先生助教,他当时与吴组缃教授同住于未名湖畔镜春园一四合院,经常约我到他家与吴组缃先生家聚谈、吃饭。1980年7月他正在写《杜甫评传》时,特地用毛笔抄录赠陈毓黼先生一首长诗,并云:“兄来札询及该书撰写之事,盛情可感,故书此作为汇报。来日苟得完篇,定当奉呈乞教也。”后于1981年5月、9月又连续写信给我,谓稿已写就,“求序”。我实不敢作,推辞再三,他就托林庚先生致命于我,我

就遵作。今天我重阅此序校样,又翻阅他当时给我信的手迹,缅怀之情,充溢于心。

又,我不少篇是为中青年学者所作的。我在序中特别注意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思路、风气极有关系。在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所作序中,即提出:“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又如199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日晷丛书》,收有十二种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著作,都是曾获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所著。这些学者我大都有交往,也参加过他们的论文答辩。我应此套书的主编吴先宁同志之约,为作总序,就提出:“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研索。”正因此,我在为张忠纲《全唐诗大辞典》所作的序中,就特地引用盛唐诗名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来作形容比喻,寄抒对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展望。

我现在所辑之序,上起有关先秦之著,下历汉唐及宋元明清,直至现代(如新编《宁波市志》)。说实话,我当时撰写时,甚感艰难,说好似一个中学生习写作文。正因此,我有时就连读其稿两遍,并作有礼记(见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等序)。今春为张明华教授《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作序,就又特地请他寄其前著《杜甫研究论集》、《丛生的文体——唐宋五大文体的繁荣》,同时研读。我在为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所作的序中,也就特为提出:“从近十余年来尚君先生著述来看这本论文集,对他的治学路数与研究风格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之所以将此书起名为《学林清话》,即本于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中之“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句。陶诗意谓与挚友临别,当应连续两夜(信宿)叙谈,以抒清切之情。这也是前面提及的“切于学”的旨趣。限于篇幅,我不再细述。我这里想再引述刘勰的一段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刘勰对治学的知音深有寄望,也感甚有难度。我从所作的序中,深为慰勉的,是我在治学的经历中,觉得知音并不难觅。正如我在《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文之前所写的两句话:“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学林春秋》三编,张世林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谨以此作为此序结语,求教于学界友人。

另我特向王世襄先生深切致谢,他为学者前辈,今已九十四高龄,仍为本书书名题签,真使我益有“知音”之感。

二〇〇八年七月上旬

目录

陈贻焮《杜甫评传》序	(1)
邓绍基《杜诗别解》序	(4)
《李白在安陆》序	(7)
《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序	(11)
《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	(15)
欧文《初唐诗》中译本序	(19)
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序	(23)
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序	(27)
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	(32)
点校本《五代诗话》序	(36)
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序	(49)
王洪《唐诗百科大辞典》序	(53)
吴在庆《杜牧论稿》序	(56)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序	(60)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序	(65)

陈振濂《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序	(69)
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序	(73)
蒋长栋《王昌龄评传》序	(78)
王洪《中国文学宝库·唐诗精华分卷》序	(81)
黄珮玉《张孝祥研究》序	(85)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	(88)
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序	(92)
《宁波市志》序	(95)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序	(97)
《韩愈研究论文集》序	(102)
柳晟俊《唐诗论考》序	(106)
《天台山历代诗选》序	(108)
翟胜健《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序	(111)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序	(114)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序	(120)
《日晷丛书》序	(122)
《宁波风光画集》序	(125)
张清华《韩学研究》序	(127)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序	(130)
《百年学科沉思录》序	(137)
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序	(140)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序	(146)
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序	(151)
张忠纲《全唐诗大辞典》序	(155)
陶文鹏等《宋词三百首新译》序	(158)
《中华古诗文名篇诵读》序	(161)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序	(164)
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序	(168)
方勇《南宋末年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序	(171)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	(174)

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	(179)
《名家彩绘四大小说名著》序	(182)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序	(185)
《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	(188)
《中华名人轶事》序	(193)
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	(199)
黄世中《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序	(203)
傅明善《宋代唐诗学》序	(206)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序	(209)
陈耀东《唐代诗文丛考》序	(213)
四库本《毛奇龄合集》序	(219)
竺岳兵《浙东唐诗之路》序	(223)
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序	(225)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序	(228)
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序	(232)
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序	(235)
《全宋笔记》序	(239)
陈耀东《浙籍文化名人评传(唐五代卷)》序	(245)
毕宝魁《九梅村诗集校注》序	(248)
徐宗文《三余论草》序	(252)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	(257)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序	(262)
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序	(267)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序	(273)
锥三桂《王羲之集校笺》序	(277)
吴伟斌《元稹考论》《元稹评传》序	(281)
刘明华《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序	(285)
王志清《纵横论王维》(修订版)序	(289)

陈贻焮《杜甫评传》序

陈贻焮同志是我的师兄。他的年岁比我大,1953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师友对待的。贻焮同志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708),杜审言卒。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710),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之问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713);同年,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711),张说入居相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吸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

开元时期的文风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前一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着盛唐诗歌走向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像贾曾、贺知章、张九龄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716),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十八岁的青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的诗风。贻厥同志在《评传》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长安时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像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部分,摒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厥同志的这部《评传》,也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他们的某些说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

些意见作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传》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博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中,随着贻焮同志的笔触,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在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眼前。

1981年10月

(《杜甫评传》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邓绍基《杜诗别解》序

绍基同志数年来于忙中作暇,研读杜诗,并写成随札,陆续发表于报刊,今又将其所作汇集成书,名曰《杜诗别解》,交付出版,又函示命于书前缀以数言。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得获先睹,受而读之,谨略陈所感,以求教于作者和学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因后世研究者之众多,笺注评论材料之丰富,可以具备条件建立学术史的,大概首先推《诗经》、楚辞、《文选》、杜诗、《红楼梦》五种。《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红学,几乎与作品本身同样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应当说,在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中,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会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绍基同志的这部《杜诗别解》,将与建国后出版的其他几部杜诗研究一起,成为我们新时期杜诗学有所建树的著作,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大凡每一种学科,其积累的资料愈多,传统的包袱也愈重。传统中当然有好东西,但弄不好,这整个包袱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杜诗在宋代就已有千家注之称,明清两代,评注者之多,迥出乎诸家之上。这之中似乎有两种情况,一种如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所说的:“今人注书,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水;今人铨订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另一种如季振宜为钱注杜诗所作的序所说:“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步趋。”后一种之病在于不读书而舛陋,季振宜对此是挖苦得很刻薄的;前一种,陈义虽高,但容易食古不化,以致泛滥踳驳,割剥支离。从总体来说,古代讲说杜诗者,似以前一种倾向为主。黄庭坚有一句名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

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自从江西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奉老杜为诗祖，山谷的这句话也就一直为学杜者、注杜者奉为圭臬，而山谷的更有价值的话却不大为人所知：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也，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闾然入其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

黄庭坚的这段话真说得好，这是他中年以后，历尽仕途坎坷，又提炼其创作之所得，发自肺腑的话。金元时期的元好问，也正因为注意到了《大雅堂记》这篇文章，才感叹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学术史上的这些经验之谈，无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还是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从传统杜诗学的繁杂、穿凿这一倾向，回过头来读绍基同志的《杜诗别解》，则其特点（或优点）就会看得更明显。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把摊子铺得太大，他主要守住清代的几部注杜名作，即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几家注本，从这几位有代表性注家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而征引有关材料，断以己意。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是机智的做法，很可为青年学人效法的。还可以看出，起初发表的几篇，像下棋那样，似乎还走得较为拘谨，所用的材料，大致也为通常所及，后来则逐渐走动自如，材料的征引扩展到不少如天文律算、佛道讖纬等冷僻的书。但本书倒并不以材料见长，而是能把材料及时收束，不使之旁溢，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在考订是非、解释疑滞中，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每读一篇，都使人有化繁从简、弃芜存菁、推腐致新的感觉。我想，书名“别解”者恐以此，而非如作者嘲戏者之所云。

绍基同志 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还设在北京大学哲学楼。我也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作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当时中文系在文史楼。哲学与文史二处，隔楼相望，由于同行，也偶有过从；后因他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又长期担任所内的行政领导工作，我则因兴趣在诗文方面，又加种种人事原因，行迹日疏，二人的交往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淡如水”的。但他为人的质直则一直留在印象中。因此当他在报刊上发表读杜的文章时，我最初是很吃惊的，担心他除原来的摊摊外，又另辟新地，是否铺得太开，顾不过来。陆续读了几篇之后，感到这份

担心是多余的了。现在读了全书,更另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搞古典文学的人如何力求使自己的学问面扩展得开一些,视野更阔大一些。我们往往看到老一辈学者,他们做学问的面是很宽阔的,博大与精深,往往是造就大学者两个互为联系的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时代的中青年学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点上钻研有一定的深度,但往往是点,不是线,至于连成片,或较大的面积,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这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学术进展是不利的。现在绍基同志从他原有的元明清戏曲小说涉足于唐朝开宝大历时期的杜甫,即不论其实际达到的成就,单是这种研究的趣向和方法,就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于此也可考虑治学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从国外引进某些新理论、新方法,或吸收自然科学研究的某些成果时,适当结合我们民族的传统,注意总结我们同时代学者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治学成果,是会有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探索的。

由此,我还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记载: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曰:“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譎》篇)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不知怎的,当我读到某些深文奥义使人难以捉摸的文章,就常常想起那位伧道人的话来。我与绍基同志同样,这几年做学问,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路子,可能为有识者所笑,但所幸皆未故树新义,以负如来,或可以此互勉云。

1984年12月

(《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出版)

《李白在安陆》序

《李白在安陆》一书,经过作者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正式出版了。安陆的同志希望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我觉得由我为本书写序未必合适,因为我虽然是搞唐代文学的,但对李白并没有专门研究。但我还是答应写了,因为我多少了解一些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作者们这几年为写作此书而跋涉奔波,其中的甘苦我也稍有些体味;另外,我也想借此就唐代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当然,也有些情绪上的快慰之处,因为我看到书中的一些文章间或引征了我的某些考证所得,正如我也注意到了他们有几位同志写文章表示不同意我的另一些论点。我觉得,安陆的同志不没人之功而又能自执己见,这种学术上的坦率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也是会引起不抱偏见的学者的好感。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表示乐于写这篇序,虽然不一定能副作者们的殷望。

本书的着手编写,还是近几年的事。安陆县考证李白的工作机构成立于1982年11月,随即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们首先在县的范围内抽调人力,征集文物和资料,对李白在安陆的遗迹作了普遍的调查。这种将文献研究与实物调查结合起来的方法,既符合地方特点,也体现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1983年上半年,他们又分组外出,跑了好几个地方,拜访了不少专家学者。我也是那时候在北京见到他们的。我为张昕等几位同志的热情所吸引,当时就不自量力地贸然许诺为今后编写的书写序言。老实说,那时我对安陆的同志的潜力是估计不足的,我以为,这本书不知何时才能写出来呢。但没有想到过不多久,一本三十万字的《李白在安陆》寄来了。书是县里印的,征求意见稿,非正式出版物,限于当地的条件,印刷装帧当然不怎么讲究。但翻看目录,全书共分十个部分,从李白在安陆十年行踪的探讨,以及诗文系年、问题讨论、遗迹介绍,一直到游踪图的绘制,不能不使人感到安陆的同志极端认真的态度。当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和我正负责编辑《唐代文

学研究年鉴》，我就马上写信给年鉴编辑部的阎庆生同志，请他组织一篇书评，同时又请他与安陆联系，请安陆的同志写一篇介绍他们工作机构的文稿。庆生同志就请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研究室的阎琦同志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1984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上，这是这一辑年鉴“新书选评”专栏的唯一一本不是正式出版的专著。同辑也刊出了安陆的同志写的《湖北省安陆县考证李白办公室简介》一文。1986年4月，在洛阳召开了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那时这一辑年鉴出版不久，我听到会上不少同志对这两篇文章很感兴趣。

这本三十万字的书竟在一年之内完成，作者们的效率由此也可想见。但毕竟时间匆促，难免粗糙。在这之后，安陆的同志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对该书进行修改。在这期间，我也收到过他们一些单篇的修改稿，但由于工作忙，未能及时提出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安陆的同志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不尽相同之处，也有争议，有些同志还把争议点写成文章寄交给我。由于缺乏研究，我当然不可能对这些分歧表示意见。我只是表示，希望按照双百方针来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是正常现象，只要处理得合宜，不但不会妨碍团结，还会促进团结。不过无论如何，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安陆的同志在学术上的认真精神，他们确是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现在书已正式出版，等待着学术界和读书界作出评价。评价可能有各种各样。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基本上是成功的。对一本书的评价，应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譬如，我们应当考虑到，本书的作者原来几乎都不是专业工作者，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李白研究的行列中似乎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白手起家的，而前后编写的时间又不长，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即使抛开这一些不谈，单就内容而言，则他们的创获也已非一般。全书的框架与原来的大体一致，去掉了民间传说一节，可能认为渲染过多，不足为据吧，其实如作适当的安排，也未尝不可列入。

《李白在安陆十年行踪》一节可读性很强，有些段落文艺气息很浓厚，不但对一般读者颇具吸引力，就是对专门研究者也能起开阔视野的作用，虽然他们可能会感到某些描述于史无证。这一节其实可以接《李白在安陆十年论略》放在前面去的。就全体而言，我以为本书基本上是一部资料考证著作。可以看出，作者们努力吸取了李白研究的已有成果，特别是近年来的新成果，并由此出发，作了新的开拓。如本书接受李白两次入长安的说法，但认为初入长安是在开元十九年春至二十一年秋，以证成李白诗“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之说。这就较现有的几家说法合理。又如认为李白诗中的“淮南”一词不专指淮南道治所的扬州，也较妥帖。其他如考证“郡督马公”为马正会，考证长安紫极宫的设置，考证任华、李邕的生平，都极精细，有新见。李白第一次离长安的路线，书中认为是出子午谷，登太白山，循汉

水东下,学术界对此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此说仍有参考价值,作者提供的材料和作出的推论是能给人以启发的。

李白在安陆的十年,对李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时李白是二十七岁到三十六岁,是他的思想形成和创作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第一次入长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接触,和一些著名诗人的交往,也都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又以安陆为中心,漫游南北一些地方,使他对开元盛世以及潜藏着的社会矛盾有了具体的感受。这对他下一阶段的发展无疑是很重要的。本书正是以李白生平中这一重要时期为中心内容,展开论述和考证的。这对于整个李白研究来说,应当说是一个促进,就唐代文学研究来说,我们是欢迎安陆的同志所作出的贡献的。

建国以来,李白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与杜甫研究相比较,问世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杜甫的少,但就创获来说,我个人以为李白的研究是领先的。不管是论述李白的思想和艺术,还是考证李白的事迹,都有显著的、使人一新耳目的成就。但李白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作家,他的思想尤其复杂。我以为,不了解李白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他的诗歌的艺术价值。研究李白,包括研究他的思想,有所谓宏观和微观两法。照时下的倾向来看,似乎宏观研究更易为人所重视,更使人感兴趣。但我以为,对某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有时只有把范围加以缩小后,研究才可更为深入,而宏观也才会更有基础。具体来说,研究李白的思想,我认为首先要做的,一是作品真伪的辨析,二是作品年代的论断。有些论文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但所依据的作品乃出于后人依托,这就大大影响了论述的科学性。这一点过去已有一些文章论及,这里就不多说,我想着重说说作品断代(或系年)的问题。

断代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有时,它还是某门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甲骨文自上个世纪被发现以来,一直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收集、摹印、考释的著作陆续问世,这些著作都有它们的贡献。但真正可以利用甲骨文字来有效地探索商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就只有先将它们分期。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甲骨学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对于父甲、父庚、父辛等具体人称的考定,而在于他开创了这一科学方法。后来郭沫若先生也正是进一步发展了甲骨文字的断代学,用之于商代社会的全面研究,就为科学的商代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又如作为中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已经产生,当时出现了一些古器物 and 古文字的金石图谱。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序中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这几句话很有代表性,可以见出当时社会金石学家摹印或拓印,很大部分是出于一种怀古的情绪和艺术上的爱好。只有到了近代,才把两周青铜器铭文真正当作历史研究的史料来看待,也正是郭老的《两周